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

□ 张晓彤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主要涵盖在《日知录》卷七至卷十九，核心观点是《与公肃朔书》所言：“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义，而其本在于养廉。”他孜孜以求探寻廉政建设规律，是为了实现“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的人生志向。顾炎武的廉政思想既汲取历史滋养又立足现实问题，主张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为后世怎样实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官员清正开出良方。

君臣来自百姓。顾炎武通过考察上古时代君臣产生的历史渊源，提出“为民而立之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这是对“三纲五常”等级制度观念的辩证否定，认为君主也是一个普通的职位，不是能够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天之骄子”；官员同样来自百姓，原先也靠耕田谋生，不是天生高贵，厘清了君民之间的关系。顾炎武认为建立一个清廉政府，统治者要确立“救人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的权力观，将为百姓分忧解难看作自己的本职所在。

取士先看品行。顾炎武生于明末，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失败，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认为八股取士危害远远大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他深刻揭露科举制度诱导读书人为追求高官厚禄而苦读，一旦中举为官往往形成大肆贪污受贿的补偿心理。顾炎武认为要选拔真正的人才，必须综合察举制和科举制的优点，实行以考察品行和民间声誉为主，同时考核个人处理实务能力为补充的选拔制度。他说：“崇礼让以厉己，简节义以标

信，以敦朴为最先，以雕虫为后科”，强调只有罢黜不择手段搜刮百姓钱财的小人，选拔心忧天下、执政为民的君子，才能促使官场风气清正；只有制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公开公平公正录用程序，才能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推行廉政善政夯实人才基础。

为官崇尚俭约。成于俭，败于奢，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是从统治者追求奢靡生活开始，一个官员的贪腐也是从滑入过度享受起步。要保证政权稳定社会安宁，朝廷大臣必须率先垂范，崇尚俭约。顾炎武举例蜀汉丞相诸葛亮向后主上书，说自己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田地十五顷，足够家人正常生活开销，自己平时带兵在外，所需生活用品都是官府提供，不再需要谋取钱财，希望自己死后，不要给家庭积攒多余财富而辜负陛下的期望。顾炎武认为任用俭约的重臣能够净化官场的不良风气，告诫后世统治者要重视涵养官员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样才能达到“修其身，行作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的善治境界。

用权必受监督。顾炎武列举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要目巡视四方，黜陟官吏。唐太宗根据巡察结果将二十名优秀牧守提拔奖励，判决七个犯严重罪行官员死刑，罢黜流放数百名不合格官员，以后多年坚持巡察，让权力在规则下运行，造就了贞观盛世。元代实行风宪之制，建立中央各部不法官员由御史台弹劾，地方官员违法由行御史台弹劾的分级监察制度，规定每年的八月到次年的四月，由朝廷统一任命官员进行巡察。明太祖明确监察人员只对官员贪腐枉法事项进行问责惩处，不得干涉地方具体事务。顾炎

武认为通过巡察，带来的是“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的清明政治。以详实的史论证明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用权必受巡察的治吏之道。

“清议”制约腐败。所谓“清议”是指古代民间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言行议论评判的舆论力量。顾炎武认为要确保权力不变质不变味，除了要严格的内部巡察，接受外部的舆论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只要政府有治理不到位的地方，要允许百姓提出批评意见。他赞赏汉代实行的乡举里选的评议制度，一个人在被推举做官之前，必须充分征询民意，考察他的生平事迹，如果发现有道德上的污点，立刻遭到唾弃，不得为官。顾炎武深刻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发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如此警世恒言，意在告诉后人民意不可废的治国之道。

奖廉涵养清正。顾炎武认为要让官员养成廉洁从政的行为习惯，除了要不断进行礼仪规范的道德教育，筑牢拒腐的防线，也要关注普通官员的收入能否正常养家糊口，他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主张对那些笃志学问、品行端正的君子可以授予翰林、国子监的职位，而不必去专营官位；对一生勤勤恳恳为民谋利、一贫如洗的清廉官员在告老还乡时，朝廷要赐给他们五顷十顷的田产，国家免其租赋，让他们用这些收入来养老，规定这些田产可以传给子孙后代，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是清廉为官得到的奖励。

除贪须用重典。顾炎武详细考证吏治史，得出凡是用重典惩治贪腐的时期，政治普遍较为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对惩治贪腐失之于

宽、失之于软，政治普遍黑暗，民不聊生。顾炎武提出有效根治贪腐的三条举措。第一不徇私。君王带头贯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正原则，不能护私偏袒。第二不赎罪。凡是犯了贪赃枉法罪，绝不赦免，绝对不能用功劳钱财来赎罪。认为赎罪不仅纵恶，而且败俗。第三罪及子孙。为了打破贪腐官员“牺牲一人，幸福全家”的侥幸心理，必须增加贪腐者的违法成本。对于贪官污吏，不仅对本人处以重刑、抄没财产，还要罪及子孙。顾炎武纵览历朝历代治乱兴邦的历史典籍，目睹明末吏治腐败而亡国的深刻教训，得出“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母贪，不可得也”，强调治国必先治吏，惩贪须用重典。

家事岂能放任。顾炎武认为官员要教育子孙勤俭持家、耕读传家、遵纪守法、谦逊待人，秉持“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的治家理念，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钱财，要给子孙留下美德学问。他赞赏包拯训戒子孙家训：“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莹。”官员本人应树立“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的志向，克服“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的缺点，做到在任时清廉勤政，把精力放在治国安民上，离任后进业修德，保持晚节，为教化一方社会风气、造福一方百姓出谋划策。



自由、平等、博爱是18世纪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这三个词全都提炼自法国启蒙运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价值理念在法国启蒙时代的确立，全都离不开中国智慧的支撑。这从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自由观的深刻影响中可见一斑。

毋庸置疑，英国文化对伏尔泰宣扬的“自由”理念影响甚大，但我们也知道，这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中国迷”，而他迷恋中国，似乎就是因为他在在中国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自由样板”，还因为他发现中国文化能为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提供某种特别的助力。

众所周知，伏尔泰所崇尚的自由，首先是思想言论自由，因为他坚信这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比如他说过，古希腊人之所以“最有创造才能”，就是因为他们都“可以自由地思想”。也正因如此，伏尔泰特别痛恨西方的“一神教”专制，认为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展严重受阻，主要就是这种宗教专制压抑思想自由的结果。在通过传教士的媒介了解到儒家经典和中华文化概况之后，伏尔泰很自然地感到了一种深深的震撼：原来在遥远的东方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那里没有任何宗教压迫，人们拥有自由的思想，因此成就了一个堪称全球榜样的文明。于是，他对中国圣人孔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在他的《哲学辞典》里发出这样的感叹：“究竟是什么宿命（这对于西方人也许很耻辱），让我们必须到世界的东端去找这么个质朴无华的贤者，他在公元前6世纪就在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这位东方贤者就是孔子……从他以后，整个世界就再没人提供过这么好的行为规范了！”

伏尔泰还说他钻研过儒学的全部著作，并且都写了摘要。据统计他有80部作品和200封书信论及中国，谈到了中华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还曾在他的《论风俗》一书里，批评一些旅行者和传教士“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仅因为看到人们跪拜君王就断言古代中国盛行专制制度，并接着作出了这样的反驳：“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的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的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就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各衙门提出的旧谏从来都具有法律的效力。”曾在旧制度法国两次因言获罪被投入

伏尔泰自由观的中国印记

□ 高毅

巴士底狱或被迫长期流放的伏尔泰，看到古代中国这种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现象，不禁感慨万千：这哪里是什么“专制”，这是“政治自由”啊！中国人民真幸福，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自由的！伏尔泰这位欧洲启蒙运动的“总司令”把中国树立为欧洲的“自由样板”，可见中国文化对他影响之深。

毋庸讳言，伏尔泰说传统中国也有“政治自由”，其实只是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比较精华的一面。伏尔泰的睿智在于，他只看事情的本质或主流。中国文化有重“史”的传统，“历史”在中国，也正是大部分人格正常的君王都特别忌惮的东西，它对君王权力的制约作用丝毫不亚于18世纪中叶法国兴起的“公共舆论”。这一情况显然与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质有关：中国人虽然是入世的，但他们也有对“永生”的渴求，只是由于没有一种教文化，中国人一般都会下意识地把“永生”希望寄托于历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后身后名”之类的诗句，便是中国人特有的这种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所以，说古代中国有“政治自由”的伏尔泰，看似“片面”，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参透了。

总之，源自英国的“自由”价值能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得以牢固确立，伏尔泰居功至伟，同时中国文化的榜样作用也不可磨灭。

在俄国众多汉学家中，以翻译中国文学著称的罗高寿、研究汉语言的龙果夫和编撰汉俄词典闻名的鄂山荫，因均出生于1900年而被称为“20世纪初俄国汉学三杰”。其中，罗高寿更是将“汉学”变成了“家学”，代代传承。罗高寿是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罗加乔夫（1900—1981年）的中文名字，他是俄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官。“罗高寿”是罗加乔夫这个姓的谐音，表示健康长寿的美好寓意。

亲历并参与中国国民大革命

1900年2月，罗高寿出生在俄国的乌斯季卡诺诺戈尔斯克市（今哈萨克斯坦东部）。20岁时，罗高寿考入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东方系，后来转入莫斯科东方学院，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于出色的中文水平，正读大三的罗高寿被派往中国进行实习。五千年的深厚文化深深吸引着他，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体味着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勤劳坚毅的品格令他钦佩，苦难的生活又让他同情。当时中国正值国民大革命时期，罗高寿亲历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大潮。1926年，他担任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并同国民革命军一起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政治形势恶化，罗高寿被召回苏联。

回到苏联后，罗高寿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培养革命人才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翻译部主任，之后又被调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成为一名外交官。1928年秋，罗高寿被派到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工作。这是他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在这里工作了6年。1936年，罗高寿第三次来到

俄国汉学家罗高寿：把“汉学”发展为“家学”

□ 尹永波

中国，被派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新闻处。3年后，罗高寿带着全家回到了莫斯科，同时也开启了他精彩的教学、研究和翻译生涯。

1951年，他以论文《以固定词组表现的汉语成语（基于孙中山和毛泽东著作材料）》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后又获得博士学位。罗高寿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苏联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东方语言学院、莫斯科远东学院等多个单位，担任汉语语言学和中国文学教授、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在长达41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苏联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苏联的外交界、教育界、汉学研究等各个领域，为苏联客观了解和认识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翻译《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文学名著

罗高寿一生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笔耕不辍编纂教材、词典等工具书等，发表诸多汉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在俄国汉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翻译研究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是罗高寿最主要的汉学研究贡献。罗高寿先后在中国工作生活近13年，热爱中国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段特殊的经历，让罗高寿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他愿意将中国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介绍到苏联，让苏联人民鲜活地了解中国

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朴实善良、充满英雄气概的中国人民。

1955年，中国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被罗高寿首次翻译成俄文，由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一问世就受到热烈欢迎，北宋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俄语读者极大的兴趣，以至于该书于1959年第二次再版、1997年第三次重印。

1959年，罗高寿与汉学家科洛洛夫合译出版了《西游记》俄文全译本。为了便于读者更好理解《西游记》，他发表了大量论文介绍作者吴承恩及其创作背景，阐释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如《论中国中世纪文学家吴承恩的世界观》《吴承恩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的讽刺成分》等。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苏联读者有随时阅读的习惯，罗高寿特意将《西游记》编辑了一个便于携带的节译本——《猴王孙悟空》，也备受欢迎。对于吴承恩，罗高寿在书中是这样评价的：“《西游记》的语言说明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他在这部小说中天才地运用了极其丰富的语言词汇，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传统古文，在他的笔下极见功夫。有充分根据可以说，吴承恩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方面掀开了新的一页。”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为此部书稿画上最后的句号。198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室经过3年的整理，最终出版了他的遗稿《吴承恩及其《西游记》》。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罗高寿还翻译出版了《中国宋代小说选》《碾

玉观音》《古今小说》等。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罗高寿可以说是酷爱。罗高寿高度赞扬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赞扬文艺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他非常喜欢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简单朴实、通俗易懂”的特点。他拥有大量中国现代文学藏书，阅读之余也将鲁迅的《祝福》、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以及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优秀作品翻译成俄文，备受俄语读者的喜爱。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积极地参与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代表先进思想的文学。中国最先进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作品，创作主题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的战斗功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中国人民饱满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推翻反动封建统治等，与当时的现实问题和重要事件密切相关。

很多俄语读者正是通过阅读罗高寿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正如他的儿子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1932—2012年）回忆父亲时所说：“他力求使苏联人理解中国，热爱中国的杰出著作，就像中国人自己千百年来热爱自己的经典文学杰作一样。”

把“汉学”和中俄友谊代代相传

如果说，罗高寿用其一生为中俄

成俄中两国关系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升级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也是他亲自参与起草的。此外，他还积极推动两国边界的划定等历史进程，多次参与两国边界的文件起草工作。

除了儿子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以外，罗高寿的女儿加琳娜·斯捷潘诺娃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赫赫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1年，加琳娜·斯捷潘诺娃调入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成为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方面的专家，曾先后发表《论中国的统一战线》《政党与统一战线》等诸多关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论文和专著。罗高寿的孙子伊利亚·伊戈尔耶维奇·罗加乔夫是在中国读的中学；孙女佳林娜作为国际文传电讯社的驻华记者常年在北京工作生活；重孙阿列克谢更是继承了家族前辈的事业，200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俄罗斯外交部任职，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罗高寿家族成员在读大学期间，几乎都将选修中文课作为自己的选择，罗高寿家族已经成为“汉学世家”。

世界各国喜爱并研究中国文化、成就斐然的汉学家不少，但像罗高寿家族这样几代人热爱中国文化，并与中国友好交往作出不懈贡献的“汉学世家”是凤毛麟角。自20世纪20年代起，罗高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这个缘就像火炬一样，一代又一代传承着。罗高寿的家族史见证了100年来中俄关系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他们渴望让俄国人民了解璀璨的中华文化，为两国人民能像好朋友一样携手前行而不懈努力着。

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俄罗斯联邦首任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上院议员等职务，为中俄关系深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他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事务。他始终强调“中国的重要性”，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甚至被俄国人称为“苏中关系正常化项目的首席设计师”。1992年4月，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直到2005年73岁时才结束长达13年多的任期回到莫斯科。在大使的岗位上，他更是积极推动俄中关系的发展，短短几年促

